

《两岸文化星系》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董乃斌 龚鹏程

执行主编

李纪祥 刘志伟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盾	王成勉	王兆鹏	刘志伟
刘跃进	陈 飞	尚永亮	李 浩
李纪祥	李朝东	张 兵	汪涌豪
张伯伟	张克非	张宏发	吴承学
陈晓龙	赵孝萱	高柏园	龚鹏程
董乃斌	傅 刚	蒋秋华	雷紫翰
翟本瑞	颜崑阳		

六 刘知几的史体论与备体观 撰 陈 旭

七 『编年』论述

时间之镂刻 撰 陈 旭

八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体』 撰 陈 旭

九 历史与不朽

在时间中的『在』与『逝』 撰 陈 旭

序 董乃斌

序 龚鹏程

序 萧康宜

自序

一 何谓历史

『史学导论』之教学与提问

二 以『史』为学与以『历史』为学

三 时间·历史·叙事

可逆性 可断性 转述及其他

四 『言』与『文』

《史通·言语篇》中的历史语言观

五 赵氏孤儿的『史』与『剧』

文述与演述

序

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海峡两岸的分隔睽离已逾半个世纪,但人民之间的往来和学术文化的交流,却因为中华文化的根系缠结、血脉相连而始终并未完全断绝。近年来,两岸的学术交往更是相当频繁。这里,既有学者间的互访切磋、合作研究和资料的共享,也有相互邀请客座讲学,或共同筹组举办学术会议等等;至于学者们各类著作在两地交互出版,或同时出版,也早已司空见惯。两岸学者的知识背景、学术趣尚乃至运作的路径、方法、习惯,都各有特色,如此交流,适足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些年来,两岸学术文化均颇有提升与进展,此种来往交流的推动促进作用不可低估。当然,目前还有种种的不方便不通畅不自由,还远远未达到我们理想中的状态,所以,两岸有识之士都在做着进一步的努力——感人的愚公移山式的努力。

“两岸文化星系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丛书的研究对象是我们共有的中华文化,具体范围则是中国文学、史学、哲学与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关系,题目有大有小,可古可今,涉及面宽广,观念视角各异,方法手段不同,每本书都是一家之言,都力求有所创新,而归根到底则是从不同角度来审视、剖析、估量和论证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民族文化,既阐扬它的历史价值,也试图探寻它更新和发展的途径,而我们深心的抱负则是要使中华文明在全球化的汹涌波涛中稳立潮头,并且能够乘长风破万里浪。21世纪,中国

人、中华文化,理应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

丛书的计划则是从小做起,一辑一辑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出下去。我们的每一本每一辑或许只配算是一砖一石,但积累起来,却也能铺一段路。我们愿踏踏实实地为两岸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为中华文化的继承发扬,为中华民族乃至为世界的今天与未来,做一点事,愿以我们每一部呕心沥血的著述,充当前进之路的铺路石。“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先人的教诲永远策励着我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还很具体地体现了祖国西部与台湾的合作。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使之赶上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是中国致富致强的战略关键,也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而目前,调动全中国全民族的力量投向大西北的态势已然形成,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好的机遇。由台湾和大陆两地学人合作编辑这套丛书,并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也算是我们为这个伟大事业所奉献的一点微力吧。

衷心祝愿“两岸文化星系丛书”顺利诞生,茁壮成长。
是为序。

董乃斌

2003年7月10日于沪上

序

中国历史上共有八个分裂或分立的时代：春秋战国、楚汉之争、三国、南北朝、隋唐之际、五代十国、宋金对峙，以及现在两岸分隔的局面。

每个分裂或分立的时代，都是历史论述的焦点，原因有三：

（一）政权由统一趋向分裂分立，再由分裂分立走向统一，其历程起伏动荡，最具有历史的动态发展意味，足以观古今之变，了解国家分合与兴衰之故。

（二）分立的时代，自然会形成政策、人才、资源、文化、社会、方略等各方面的对比性，形势既足资比较研究，自然吸引人关注。

（三）除了历程充满动态，内部又饱含对比之张力以外，分裂的时代亦必充满了各类冲突，包括军事与非军事之冲突，引生出许多故事，远非承平时期的平凡枯淡可比。我们看古代许多讲史小说都喜欢拿这些时代来评说渲染，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这么说，不免有些“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意味了。凡分裂分立之时代，其实都是不幸的。政权之争，往往形成军事与非军事的对抗、人民流离、骨肉失散，文化也常遭到撕扯。故其引人注目，令人为之讲说评议不断者，正因其易使人为之唏嘘浩叹也。

然唏嘘浩叹，愁苦之言易工，四海涂炭，也许反而成就了几卷好诗。而对峙与分立，事实上也让社会文化有了分别发展的机会，形成

不同的风景,足资观玩,此所以不幸之年代反而可能在文化上大放异彩,像春秋战国就是如此。

两岸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隔海分治已五十余年。岁月如流,人情未改,其间虽屡经波折,但终究断不了文化的根脉,两岸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与发扬也各擅胜场,而且,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分隔反而形成了对比的张力,让文化的不同质素或面相,分别获得机缘,得以恣情展现。

但是,分隔的形势,毕竟又让这种不同难以交流,使得各自发展者无从因对照互补而交光互摄,创造成一个更光辉灿烂的时代,这难道不遗憾吗?

我们策划编辑出版这套“两岸文化星系丛书”,就是希望能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般,填鸿沟而移屏障,让两岸对文化的不同阐释得以交流对话,稍补历史造成的遗憾。

丛书取名“两岸文化星系”,一方面是拟喻星空中群星辉映、交光互影,共成一大星图之意;一方面也是因本丛书欲集结两岸文化研究具代表性、较有成就的作者与著作,共成一“群星会”,让如许熠熠星光,映照吾人心灵。

2 在这套丛书里,我们希望探讨:时间、历史意识与中国文化叙事方式;人文关怀理想与圣贤、英雄、游侠观念的联系;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与中华文化;爱情文化模式与中华文化;生命意识与中华文化等等。初辑五册,均由两岸中壮学者执笔,文采斐然,论析精警,无庸赘述。谨此敬识于台湾佛光大学云起楼。

龚鹏程
2003年7月

序

李纪祥教授突然来电话，希望我能为他的大作《历史·时间·叙事》一书写篇序。他的诚意邀请令我感到十分惶恐。我知道，史学并非我的本行，要为一本重要的史学专著写序，谈何容易？但我最后还是欣然接受了，因为我并非在给纪祥的书作什么专业性的评价，我只是想借着这篇序，谈一谈我所认识的纪祥，以及我对于他做学问的态度之观感。

我第一次遇见纪祥是三年前的一个八月天，地点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咖啡厅。那次我专门到台湾去开汉学会议，想顺便认识一些新朋友，所以熊秉真教授就特地把纪祥请来——那天老朋友王德威教授和王璦玲博士等人也在场。记得，我们每个人都叫了一杯冰咖啡，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来了。我正巧坐在纪祥的身旁，就开门见山地问道 ■

“李教授，你平常除了教书以外，还有什么嗜好？”

“啊”，他微笑道，似乎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的嗜好就是咖啡和写作……”

他的回答顿时令我感到惊奇，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专攻历史的杰出学者，在我的印象中，一般的历史学者都不会如此回答。然而，也正因为这个不寻常的答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发现，他的文学功力很深，颇有“文人”的气质。在短短的两个钟头之内，我们从明末

才子陈子龙谈到吴梅村,再从清朝的文人袁枚谈到龚自珍。我们同时也互相交换了个人读书和写作的心得和计划,觉得许久以来已经没碰过这样有“趣”的学者了。

纪祥的“趣味”使我想起了晚明文人所提倡的风气——那是一种“才”和“趣”融合在一起的非功利的人生品味。张潮就曾在他的《幽梦影》一书中说过■“才必兼乎趣而始化。”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才华一定要兼有率真的“趣味”才能达到“化”的高境界。

另一方面,我发现,纪祥对咖啡和写作的爱好几近于“痴”。我告诉他,这样的偏好也很有晚明的特质,因为当时的文人相信,惟其有“痴”,一个人才有真性情。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其实那个“癖”字也是“痴”的意思。因此,我提醒纪祥,他既然对写作有那么大的兴趣,就必须努力坚持下去。有很多人以为研究历史就不能从事写作,但我认为那是错误的想法。能用生动的笔调把历史再现出来,并能写得引人入胜,才是高明的历史家,我特别举出我的耶鲁同事史景迁为范例。

不久之后,我和纪祥成了笔友,也随时交换写作成果。1981年春季我们又一同在加州史丹佛大学开过一次学术会议。散会后几天,我就接到了他的来信■

“会议结束后,一个人在旧金山又留了三天,天天喝咖啡,看来往行人,写远行笔记,街边也喝,阳光下更是不能少,晃到海边,遥遥对着恶魔岛、天使岛,也不能不喝,喝了就可思可想可念,懒洋洋的笔下,随着年纪,天空的蓝也多层次起来……望着天使岛,竟不知不觉想起您文章中已表出的华人华工华史,中间已是多少映照……”后来纪祥转往佛光大学执教,在学术上进了另一个阶段。接着,他又发来一封信■

“今纪祥已至宜兰,小朝在山,心可以远,意可以收,可以望海,可以依山,可以细思量……于是知人之生命经历,皆是文章笔下返而原心之运动……”

这些年来,我发现纪祥是我所认识的新一代历史学者中最富有文人气息的人。我特别欣赏他把学问和生命融合在一起的态度。他曾

说■“无论是哪一门学问,如果与自家不贴切,也终是枉然”,“惟有生命的‘跃出’自己,才能‘呈示自己’,才能在大化与时间的迁逝之流中,继续领略文字与书写。”此外,他在信中时常谈到历史形而上学,也谈到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不但有议论,而且字里行间总是充满了诗意。我特别喜欢他这种富有“诗意”的人生观——对他来说,诗即人生,人生即诗。但他绝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的人,他广泛涉猎,充满了好奇;而且对于所读到的新理论和形象思维,总是设法用自己的语言再现出来。他有关这一方面的想法,有时流露在学术文章里头,有时流露在信件中。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一向精读匀量读票字范造回理像重找世则票云模精志票预拜老票习期则弃等人的作品,总觉得这些理论大师的声音有如磁铁一般地吸引着我。现在看见新一代的历史学者李纪祥居然能用一种富有诗意的语言把这些理论和生命衔接在一起,怎么不令我感到兴奋呢?

在纪祥着手撰写《时间·历史·叙事》这本书的那段期间,我有幸先看过其中的几章,因而特别感到欣慰。我认为,他书中的章节,不管是内涵或形式都相当突出,为历史的“书写”写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中他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关联作出了深刻的探讨,此外还把传统意义上所谓史实之“真、假”进行了令人十分信服的“解构”。记得当初刚接到《赵氏孤儿的“史”与“剧”》那一章时,我就衷心佩服纪祥的功力,觉得那是重新检视“历史”定义的一篇难得的佳作。这篇文章主要在讨论历史上“赵氏孤儿”的故事之演变,全篇写得十分生动而有趣。原来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个故事本来只是有关赵氏家族由于私通乱伦而产生的流血事件。一直到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该主题才渐渐涉及赵氏孤儿的复仇故事。但最后真正把焦点变成“赵氏孤儿”,而又开始关注女性角色赵庄姬者,却是元代的剧作家纪君祥。可以说,“赵氏孤儿”的故事后来之所以在中国民间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实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剧本不断被搬上舞台一事息息相关。(请注意,这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巧合——李纪祥的名字与元代剧作家纪君祥颇为相似。)重要的是,纪祥在此利用了“赵氏孤儿”的故事演变来说明历史“真相”的无法捕捉——事

实上,任何叙述都是一种变动、一种新的解释。即使作为第一个“文本”,《左传》并不一定比《史记》来得更接近历史真相。所以,其关键“并不是史实真假的问题,而是本事与新编的对待”。换言之,既然历史都是由人一再叙述出来的,它已经无所谓真假了,历史本来就充满了某种“诗性”。

我认为纪祥的书中所处理的主题就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界里最为关切的“再现”(再现)和“演述”(演述)的问题。本来,“再现”和“演述”既然都涉及到语言的叙述,它们就无可避免地会产生歧义和“漏洞”。^①据著名文学批评家 宰德曼所说,这种“漏洞”其实说穿了就是所谓的“文学”。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的是,纪祥一直所希望做到的,就是把这种充满“漏洞”的文学叙述性推广到历史的研究领域中。而这也就是他撰写这本《时间·历史·叙事》的主要目的。有趣的是,这本书的缘起涉及到作者个人的一种“困惑”,一种对历史研究本身的困惑。于是他就把书写本书的经验形容为一个“惑史的心路之旅”,他希望他的书能终究“贯穿其间之‘惑’,撑开来说其所惑之世界”。

纪祥以“不惑”之年而能进行他的“惑史”之旅,也算是性情中人了。盼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能以充满情趣的心怀欣赏本书中的言外之旨。是为序。

孙康宜

一九九四年 远月 远日 写于耶鲁大学

自序

这本论文集集中的九篇文章,记录着笔者十年来治学历程之一端,主要集中在历史与理论两层。由《何谓历史》始,以《历史与不朽》终。隐约仍可看出一个主轴居于其间,笔者自名为“惑史之旅”。这种以“惑史”为轴的治史历程,说来容易,但也实有机缘。照说人的知识成长本来就是以“疑”为始,以开开心心得“解”为终。但如果是先以“解”而始,设定了一种方法训练,那么,即便填塞再多,也只是记诵之学。

无论是哪一门学问,如果与自家不贴切,也终是枉然。对笔者而言,如果不是在华冈甫得博士便留校任教,担任“史学导论”课程,因“导论”而迷途于“史学”的“林中路”,而致支吾,不能言、不能思,坠入林中茫茫的雾,恐怕至今都还在自以为是的一块地基上,安然地以“方法”为“路标”,为切近“历史”乃至“得到历史”的不二之途,原来就算“历史”换成了任何异文:“~~历史~~”或“~~历史~~”,也不能证明你已进入“历史”!那么,“历史”应当如何贴切于自己而终于能展开一条眼前成学之途呢?笔者在教了一年的“导论”课之后,逐渐觉得“躲在讲桌之后”,也是一个可以存在的世界,正是在那里,对“何谓历史”、“史学是什么”,产生了大有疑之惑问。如果讲桌之前的口耳宣讲及摊开在课堂之中文字呈现的讲义——但靠着几本书肆中方法、导论书剪辑而成,就能导论历史、传达学问、传述“~~历史~~”的古注今义,那么,着实是一个时代历史学 ~~轶~~ 学的大悲哀了。诚如笔者在《何谓历史》一文的

结尾所言：在门槛外者轻声一问中，已无立足之所！与其自欺欺人，不如从“躲在后面”中“走出”，承认自己确实原来在史学园地中，是一个门外汉、未了汉，尚未挑柴担水，也尚未上山下山。如果自己都不能心安，又如何能在己、在人，“史”能是一个“自家贴切”后一番轮转的“实存”呢？更何况书肆中的“史学”书，多是以“社会科学”之方法及意识移植而来，对与不对，笔者无由置喙。（这九篇文字中无一论及社会科学的。）但笔者至少有一种感觉来自于不愿一个好端端的人文世界，就此被“方法”方块其间，书房内与书房外，也好端端的竟是两个世界，尤其是长年在华冈晨起依山夕暮望海的世界中，更能体会图书馆的内与外，始终是一个共濡的场景。

当吾人起始便在视野中只能看到司马迁的“如何搜辑史料”时，又何尝能想到《太史公自序》的作者自安排一场戏剧对话体——史公与壶遂，以及《昭明文选》中收录的《报任少卿书》之“人间凄怆”，也是史学身世之一环呢？笔者对自己的不安虽还不至自贬，但对自己华冈史学系毕业的“史学”二字之身份，则确实敏感，既愧师门，也有负于据说是由陆王心学而转手的浙东史学之一缕传承。章学诚曾誉邵念鲁之史文为五百年来浙东仅见，而邵念鲁之史文之大者却是《刘宗周传》、《王门诸子传》、《姚江书院传》与《王阳明传》。史学从来未与“文章”分离，也未与“行动意义”分离，在时间中绵延的事件，仍然还是有着“选人入传”与“自承前人”的系谱观与叙事联结在其中，这样的一种起源于自身所在的自觉，正是史学是为己之学的起点。于是，扪心既不能自安，“何谓历史”就要重启其“惑”，重启其“思”之旅，而惟一的地基，就在自己脚下，在讲台之后那一隅方寸的伫足之处！

在这十年的惑史之思的历程中，要感谢“人文讲会”及“人文读书会”的一些朋友，前者不仅让我知天外，也知道学海乘舟，系乎一心；后者则伴我共读了许多吃苦的书。如无道上学侣，切磋磨砥，相互辨难，那些我认为奠下经典基础的学力，是不可能长期迄今的周复一周积累的。今日回顾，早已分不清是“过去”还是“现在”的生命感受与回忆。在回忆里，为了《自序》而调出的片断情节，竟都因此聚拢，成了某一版本的小叙事、个人生命中的小故事，有人会认为这“回忆”就是

私人性的“历史”么？

在切磋问学中，西方的文学批评及美学理论是不可少的声音，自“讲会”及“书会”的科际中冒出而贯通着，形成了主旋律，没有人敢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轻视它的成色与铢两。尤其是筹办“重读中文研讨会”的那一年，“中文”与“重读”对我们都构成了沉重的威胁，对我们所使用于书写的“母语”，已不敢再贸然与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再作出率尔的联系与历史的承诺，“白话文”仿佛更加模糊，正因为这样的茫然，疑惑又为我们重启了一扇门，我的《言与文》之写作背景资源来自于这段经历，也为尔后的“近代人文的形成”之小型座谈会有了一番构思。我们更会因某些阅读与讨论理论文本中的议题而借题发挥，激辩在其中所瞥见的文、史之争，文、哲之争，诗、史之争。“诗”的界限可否“清楚地”标界，“历史中的世界”或者“史传”中的人物是否就是罗丹的塑像，是否就只能是一幅印象派画作；赫塞（~~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人物典型重要，还是一场战争中的车马之数重要？在以“文”为“学”中的“文体”与“文类”之外，究竟有无“史传”？经由叙事而出的“情节”与“场景”，竟真能让我们——读者产生对古圣贤的景仰，英雄慷慨悲歌的崇拜？还是那只是一缕轻烟的情绪，是“文字”与“心理”联系的一种“意象”？历史的知识论是如何构成的？起源于何处？诗的成分又是何来？历史世界中的角色（活动）真就能呈现“古人当下一生”的“真”之精彩与“俗”之实谛么？还是只是经过“知识化”的“脉络”之处理，产生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正困难地与它“联结”，又惧怕在身后偷偷窥笑着的，正是“真理的洞穴”与“上帝”；一旦启蒙可以“知识化”我们的世界，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只好相继说“不”！一旦进入了“时间”，一切已必然能称之为“古”，因为已然是“今”。你只能“看”到一横一竖符号的入目，这符号便是踪迹，用力铭刻、濡墨、书写的人所为何来，那一股驱动生命之源的？这一问，究竟是否还是支撑“何谓历史”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

如果说十七八世纪是启蒙时代哲学的世纪，而十九世纪是历史主义启动“存在即历程”之历史式思维的时代，则二十世纪以来，文学批评与理论显然在这个时代中正开启我们人文的视野，不时促使我们

的反省具有深度。(这又如何呢?历史学必定必须要有学科种族主义来保障自己,拒斥与认定文学中的思想性、创见性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种族之邦,只能生活在湘水之畔唱歌的感性种族?)文学不再是自居于古典时代的“文学”,它可以改称为“哲学”。大卫·卡耳(阅读悦刊)在《时间、叙事与历史》(裁是藻莽拙非圆藻莽拙匀圆藻)书中,回归到胡塞尔(裁是藻莽拙非圆藻)来评议海德格(裁是藻莽拙非圆藻)“行动性”的不足,这是哲学论述,他用的是文学理论的章法。保罗·吕格尔(孕是藻莽拙非圆藻)的《时间与叙事》(裁是藻莽拙非圆藻)更是回溯自亚里斯多德(粤是藻莽拙非圆藻)的《诗学》(孕是藻莽拙非圆藻)起章,融合了奥古斯汀(粤是藻莽拙非圆藻)的“时间”再穿透至晚近的叙事学;托多洛夫(裁是藻莽拙非圆藻)《批评的批评》(悦是藻莽拙非圆藻)中隐藏性地针对“海德格”,让我们窥见了“文、哲之争”的“历史”,争的正是解释与呈现人类历史穿透力度的有效与正统。或者说,过去的哲学章法还只是草稿的阶段,必须要待文学时代的来临,哲学才正式回归正位,过去的历史学也只是取得普通阅读训练的凭证,必须要到文学阅读与书写的阶段,人类历史的意义才真正在人生诸面向中得以展开真正的“写史”。这不禁让人想到宗教时代的创世纪说中有关人类意义的起源论述;以及克罗齐(孕是藻莽拙非圆藻)区分“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的写作想法;中国的王船山所承袭的“三代史观”,“孔子”居在人文的转折点上,开启了人类历史,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涵义。人类历史总是在回顾中找寻某个支撑起整个意义的支点,而意义的地基之找寻也总是以某个时代文体承载了书写义之责。

一种企图进行历史记忆重窥的建构,也早已悄悄展开,一切的历史都是“文学史”,文学愿意改称“历史”也无妨。在圆世纪以来,他们已是昂扬自信、辽阔澎湃深邃的一群。加诸于自己身上的,已不再只是限于“文学”,“文学”显然已经发现了自己对人类世界还可有更多的(或是过多的)职责。如果人类历史的知识心灵在西方已走至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拒斥,然后说:圆世纪的历史学系谱才是自我的身份认同,那也只不过是“历史家族”的“族谱”版本之一支而已,学术的血缘岂是阅是,傅柯(孕是藻莽拙非圆藻)就能告诉我们这点,而

单就这点,他那话语辨读与考古系谱学的断层观看就足让人眼下为之一亮,击节称道。历史学不正以多种选择及独特的智慧共业来照亮世间为志,而自诩为挂在殿堂上的明灯明镜么! (“镜”与“灯”的思考及若干以此为书名者,在文、哲领域皆有。)还有什么“历史学”冀望企及的大业,它与宗教、神学、哲学与文学,能有什么不同?

如果历史学的写史大业就是文本流传的身世,如果“写史”就是“写作”,那么诚然一切的历史皆为“文学史”,更精确地说,一切写史皆为“文学”。如果一切“写作”皆为“写史”,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文学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以及他们所用以为文本者,不是“历史”的另一版本。容装“真相”的历史旧瓶,已显示出某种贫乏,我们应当深惧此点,“真相”一词的狭隘使我们早已遗忘了坐怀母抱中起源话语的感觉,失落了何以在记忆中“逝水年华”特别令人滋味万端?紧拥着“真相”,将“虚构”与“真实”对立起来,生怕离此一步便无“历史”,又岂是“文史之争”的真谛。我们正在这一代人类的舞台上携手共促人之为文,人文因为合作而分工,而分工却未必尽是专业之底蕴。

如果“历史学”已经远离此,那是在“独占性”中遮掩着自身,也遮盖了其他可能;如果亚里斯多德《诗学》中的“可能性”指的是“过去”与“未来”之遭遇会聚于“现在”之演出的话,那么任何“可能”总是“已然在”某种形式之中寓存着了。现在,文学的声音不断自理论与批评中冒出,我们必须聆听其中的“历史”,小心听、侧身听,“历史”的声音与情怀正在耳目与心中响起!我们必须再度学习,一个整日坐在案前、以学术为事业的人,他要怎样才能经历一种意义上的安坐与安住?太阳总是每日自东方地平线升起,“史权”并没有使我们壮大,惟有生命的“跃出”自己,才能“呈示”自己,才能在大化与时间的迁逝之流中,继续领悟文字与书写。当罗兰·巴特(1903—1980)努力阐述着一种不可能的零度(透明)之书写时,不正看来像是十七八世纪哲学认识论上针对“物自身万物客体”如何“认识”之可能与不可能般,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文学再版。

当皮亚杰(1896—1980)与普里高金(1917—1994)都已相继在“心理学”、“热力学”的不同领域里处理了康德(1724—1797)的问

题时，历史学界仍然捧着史学程序法则的书，泰然地奉着兰克（~~德意志帝国史~~）及其后学为师法，还不能意识到种种“知识”与“人文”的推进与反省已在身边发生。从各个方面以它种词语论述了我们的课题。“过去”是什么？是一个客体。这个问题如在康德，则显然是“不可知”的；更何况是在傅柯看来，由“过去”到“历史”，中间尚有多少断层被深埋；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触动的书写之弦，“过去”与“历史”之间，有的只是书写，理论与文本似乎成了“文字”所能升起的烟岚之最大满足的欢愉境界（我说的不是阅读）。当我们盯着文字时，想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使用汉文的阅读者，首先映入的，是版本：明本、宋本，甚至是唐卷、汉牍？当“汉牍”与“明本”加上新式标点本一齐并置在一个阅读者的案头，能有什么从彼处也从此处升起？我们能意识到这批人所带来的挑战与省思之文化生命的力道么？

近年来，笔者已逐渐意识到历史学作为文化、教化承担的一种危机，便是在于它那始终与人文及心灵的氛围之不贴切。但是“历史”——中国传统中没有这个汉语词汇时，我们要怎样才能以形似之“史”，去衔接“古今”，衔接以“史”为“学”与以“历史”为“学”呢？当带上了“历史”的眼镜重新观看世界与文本之后，我们要怎样才能成立以下学说：《太史公书》的“垓下之战”是“历史”；《史记》中的“垓下之战”也是“历史”；《史记》中记载的都（应）是“历史”；司马迁、班固记载的都是“历史”；所有的史料与文本中都有“历史”；“甲骨”与“北京人”不是“骨头”，不是现在，是“历史”；是千年万年以前的“现在”，但是现在，“头盖骨”失踪了，它正在演出着它自己的叙事而尚未著出末章——谜一样的末章，仿佛我们的未来，有谁能将“历史”的“叙事”搁笔？

当一种“近代史”切入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形成了我们生存的场域时，就已经表示，是“近代史”构成了我们与古人之间的联系，我们能否意识到，当生存场域与世界在实质上已变得小时，其实也与此有关！本书中的另一种声音便是：在已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种“近代史”的“观”与“近代史”的“馆”，似乎它的使命，也当随着民族的激情与对立而逐渐消歇息止。“中国”未来的境界不当只停驻在“近代”的